

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在中文语境下的主题研究综述

——从1998到2020

高博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 助理教授

内容摘要 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以西班牙语书写完成，同年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首次出版刊印。五个世纪以来，这部读本一直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门多萨首次在欧洲社会视域下构建起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完整的中国形象，乃至《中华大帝国史》成为了之后二百年来欧洲人书写中国著作的样本。笔者对该读本自1998年首次被翻译到中文语境以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在该语境下，关于这部读本的专题性研究进行了梳理。本文的目的是揭示海内外学界在中文语境下对该读本的研究现状，发现问题并预见未来研究趋势。

关键词 中华大帝国史；中国形象；门多萨；海外汉学；明清中西交通史

Abstract: *The Historie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 edited by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was written in Spanish and published first time in 1585 in Rome. From then on, the book alway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t is a landmark book about the image of China, which made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m a complete Chinese image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material to spiritual area. It became a sample of European writings on China in the next two hundred years. This paper has made a review on the studies specialized in this book made by scholars in Chinese context since 1998, whe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context first time. The paper aims to discover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se studies and to forese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e of China, image of China, Mendoza, Sinolog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1. 本论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从《中华大帝国史》看晚明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项目编号：18WXC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 前言

《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由西班牙政治家和学者胡安·冈萨雷斯·得·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以下简称为门多萨）以西班牙语书写完成，同年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推出了第一版，其西班牙语全名是：*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Sabidas As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esmos Chinas,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s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根据到访过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编撰》）（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5），以下简称为“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从作者门多萨的书写立场上看，这是一部在文化、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向16世纪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提供对华策略的读本。同时，这也是一部向欧洲学者及其大众读者全面且详细介绍中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礼仪、法律和宗教信仰的百科全书。该读本的出版，终于使得欧洲社会形成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完整的中国形象，其也成为了之后欧洲近二百年书写中国形象的样板。

5个世纪后，《中华大帝国史》于1940年才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其名为*The Historie of the Kingdome of China*（GONZÁLEZ DE MENDOZA J., 1940）。《中华大帝国史》的汉译语书名也是由此而来，以下简称为“1940北京英译本”。这一版是1853-1854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的影印本，其全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Compiled by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And now Reprinted from the Early Translations of R. Parke, Edited by Sir George T. Staunton*（GONZÁLEZ DE MENDOZA J., 1853-1854），该书名直译成中文是《中华大帝国史及其相关情况》，原编著胡安·冈萨雷斯·得·门多萨，罗伯特·派克（Robert Parke, ? —1689?）译早期英译本再版，乔治·托马斯·斯通（George T. Staunton, 1781-1859）再编，以下简称为“1853-1854英译本”。《中华大帝国史》首部中译本由何高济先生翻译完成，于1998年在北京出版刊印（门多萨，1998），中国学者也是从那时起才对这部读本展开了研究，以下简称“何译本”，“何译本”参照的源本就是“1940北京英译本”。可见，迄今为止，《中华大帝国史》进入中文语境仅有23年的历史。笔者基于知网、读秀、北京大学未名学术搜索、台湾地区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总库、华艺线上图书馆和AHCI数据库，对1998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华大帝国史》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笔者在“主题”、“篇名”和“关键词”中，分别对“门多萨”和“中华大帝国史”两词条进行了检索，并在检索结果中筛除了未以该读本为中心议题的研究，其对该读本仅有只字片语的提及，于本研究参考价值有限。此外，本文还筛除了与该读本同名，但编著者并非门多萨的相关文献。最终，笔者只筛选到了10篇用中文书写的关于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期刊论文7篇，与这部读本密切相关

的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和专著笔者目前尚未查询到。这也显现出，目前中国学界对这部读本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认知尚且有限。

这7篇期刊论文分别是：吴孟雪著《从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看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吴孟雪，1996），张铠著《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张铠，1998），邹雅艳著《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邹雅艳，2017），汤开建著《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汤开建，2012），赵欣和计翔翔著《〈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赵欣，计翔翔，2010），刘捷著《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刘捷，2014）以及笔者著《〈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考述》（高博，2019）。3篇硕士论文分别是：高岩著《〈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中国形象——兼论16世纪伊比利亚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高岩，2005），高宇灏著《前利玛窦时代欧洲人的中国意象》（高宇灏，2015），以及吴鸿谊著《16世纪葡西旅行者眼中的大明——一个民族志的视角》（吴鸿谊，2015）。基于上述10文，笔者发现，中文语境下的《中华大帝国史》研究可归纳为三个视域：历史学者在欧洲史、中西交通史和民族志视域下的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及文献学视域下的版本与成书参考来源考辨。

2. 历史学者的思考：欧洲史、中西交通史和民族志视域下的《中华大帝国史》

20世纪90年代在中文语境下，《中华大帝国史》最先引起了历史学者的关注。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中国历史学者主要从欧洲史、中西交通史和民族志三方面对该读本进行了研究。以张铠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者，就从欧洲史视角对《中华大帝国史》进行了现象成因分析。在《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中，张铠从作者门多萨的时代与生平、成书参考资料来源、读本的主要内容和结构以及读本的影响和历史意义这五个方面，对该读本从出版至今，一直在欧洲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张铠，1998：71-89）。

首先，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的大时代背景来看，张铠认为《中华大帝国史》之所以能够在彼时的欧洲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部读本回答了16和17世纪的欧洲社会所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其次，从西班牙本国的小时代背景来看，在作者门多萨生活的菲利浦二世时代，西班牙已陷入了全面经济危机，中国作为西班牙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大帝国史》正是菲利浦二世急需制定对华策略的国情读本；其次，从作者生平来看，门多萨书写《中华大帝国史》兼顾学者和政治家的视野，这使得该读本具有较高的水准；再次，从门多萨成书的参考史料来源看，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16世纪的欧洲人，东方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秘国度，而《中华大帝国史》乃基于亲身游历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所著一手文献编纂而成，此无疑增加了这部读本的可信

度；又次，从读本的内容来看，门多萨第一次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完整的东方中国形象，较为客观且真实详尽地介绍给了欧洲，满足了彼时欧洲读者对东方中国的全部好奇心，且当时的欧洲国家也是以此为国情读本来制定对华政策；最后，从这部读本的意义和影响来看，张铠认为，《中华大帝国史》不仅为西班牙国王提供了一部对华策略读本，其还对16和17世纪欧洲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如与门多萨同时代的外交、文学、哲学等领域的诸多有识之士曾阅读过《中华大帝国史》，这部读本显然构成了16和17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对16世纪中国社会认知的重要信息来源（张铠，1998：71-89）。

汤开建从中西交通史的视角，在《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中，对《中华大帝国史》中所载中西交往之史实进行了考证（汤开建，2012：43-65）。他利用刘尧诲《督抚疏议》，并辅以包括《中华大帝国史》在内的其他中西文献中关于西班牙人助明廷捉拿海盗林凤的记述，详细考证了林凤事件之史实。他发现，万历元年初据澎湖者为林凤而非林道乾；万历二年三至四月，林凤溃败于明军后，西逃至雷琼又东返闽海；万历二年五至十一月，林凤再次活跃于台澎地区；万历二年十一月至三年六月，林凤率众逃亡吕宋及西班牙使臣首次使华之史实。特别是，他还考证出，明军官王望高调集吕宋番兵歼灭林凤主力一事，这修正了西方文献长期流传的谬误。

吴鸿谊在《16世纪葡西旅行者眼中的大明——一个民族志的视角》中，从民族志的视角对《中华大帝国史》进行了文本批判。众所周知，门多萨一生从未到访过中国，他的书写乃基于西方前人传教士所著相关文献编撰而成。吴鸿谊认为，门多萨对前人资料的筛选与重写的方式与其传教的目的和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为此，她将门多萨的文本分为自然、超自然和政治三部分，并指出其中每部分的构建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如“自然”部分是对形而下的世俗世界的描述，旨在构建一个幅员辽阔和物产丰饶的大帝国形象；“超自然”部分则是以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为蓝本，描述中国人的异教偶像崇拜和迷信；“政治”部分则强调中国人在政治组织与维持和平上的智慧。她发现门多萨的这种书写结构有着缜密的内在逻辑：富裕的中国和迷信的中国这两种形象，最后落在政治这一领域得到了最终的解释。换言之，门多萨对中国政治的高度评价，不仅用来解释中国的富裕和繁荣，也用作批评西班牙的海外征服以及推广和平传教的精神征服策略（吴鸿谊，2015）。

除上述三个研究视角外，历史学视域仍有巨大研究空白，如门多萨成书资料详考，门多萨所处时代的背景与生平考证，门多萨未能出使中国之原因，《中华大帝国史》对同时代欧洲有识之士的影响，以及基于这部读本的中西交通史实勘误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误读等，均是未来有待探讨的历史学议题。

3.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华大帝国史》：他者的东方乌托邦与中国形象

进入21世纪，中文语境下的学者从比较文学视域下对《中华大帝国史》进行了深入思考，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门多萨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上。按照研究层次由浅入深，笔者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华大帝国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于文献考证归纳门多萨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特点，第二个层次是分析《中华大帝国史》在西方中国形象流变中的作用，第三个层次是探析门多萨构建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

关于第一个层次的研究——门多萨塑造的中国形象的特点，中国学者普遍使用了文献法，注重考证事实联系。其主要有两种比较方式，一种是中西文献比较，另一种是西西文献比较。吴孟雪在《从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看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中（吴孟雪，1996:127-132），以及邹雅艳在《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中（邹雅艳，2017:43-50）均运用了中西文献比较的方法。通过将《中华大帝国史》中构建的中国形象与明代社会史实进行比较，上述学者发现：从全书总体来看，门多萨塑造了一个神话般完美的中国形象，甚至将一些中国的负面形象也描述成了乌托邦式的美好；高岩则运用了西西文献比较的方法，将门多萨塑造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前人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记述进行比较，她指出，在门多萨笔下，中国的正面形象得到了有效加强，并成为了之后两个世纪西方人塑造中国形象的模板。特别是，她还指出，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看法，门多萨的书写姿态明显不同于前人西方传教士。以往的西方传教士普遍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全盘否定，塑造了一个愚昧迷信的中国人形象，而门多萨则极力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寻找基督教的痕迹，力图展示二者的契合之处（高岩，2005）。赵欣和计翔翔在《〈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中同样运用了西西文献比较方法，分析了这部诞生于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的西班牙语读本对16世纪末和17世纪英国的影响，并指出：一方面，《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的中国知识，为英国人地理探险和远航中国提供了理论参考，另一方面，《中华大帝国史》成为了英国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的早期重要参考文献，如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就受到过《中华大帝国史》的影响（赵欣，计翔翔，2010）。

第二个层次的研究集中在解读门多萨构建的中国形象，在整个西方中国形象流变中的作用。其同样主要使用了文献法，注重考证不同文献中的事实联系。其中，高宇灏在《前利玛窦时代欧洲人的中国意象》中指出，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蒙元时期到地理大发现时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西方人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直到《中华大帝国史》的问世，终于使得欧洲人形成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完整的中国形象。尽管门多萨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某些方面与明代史实存在偏差，但不容否认，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的中国形象流变过程中起

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乃至之后两百年间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作都以此为基础（高宇灏，2015:13-14）。高岩在《〈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中国形象——兼论16世纪伊比利亚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中也同样指出，门多萨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上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门多萨以16世纪前期和中期欧洲社会业已存在的中国形象为基础来重写中国形象，另一方面，17世纪耶稣会作品里的中国形象又是门多萨塑造中国形象的继承和发展（高岩，2005）。

第三个层次的研究是探讨门多萨美化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真实书写意图。邹雅艳在《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中运用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门多萨塑造的完美中国形象之原因进行了剖析。她认为神化中国形象，除了源于门多萨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赞叹心态之外，还有两方面客观原因：其一在于16世纪的欧洲尚且保存着对中国形象的集体憧憬的印记，且门多萨对于中国制度、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美化，多少带有了渴望以中国为镜来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的动力和希望；其二，16世纪的罗马教廷采取了尊重和顺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方针，为的是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所以，16世纪的传教士们就不得不在僵化的教规和教义与文化的多样性之间进行调和，在描述中国时极力夸大甚至粉饰中国的优点，并从中极力寻找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贯通之处，试图将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文化体系。邹雅艳认为，这正是比较文学视域下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认同和归化功能的体现（邹雅艳，2017:47）。

综上所述，中文语境下的学者在比较文学视域下对这部读本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门多萨构建的16世纪欧洲社会看视下的中国形象上。不容忽视，该主题的研究中蕴含着学科融合的趋势。如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倡导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考证，也融合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而在历史学视域下的研究中，同样也融合了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两种文化间的透视。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仍有诸多空白有待探索，如这部读本在不同语境下与不同时代下的译本与原著善典有何差异，未来有待从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和政治等方面对影响译本构建的因素进行多维深入解读。

4. 文献学视域下的《中华大帝国史》：版本与成书参考来源考辨

中国学者在文献学视域下分别从版本考辨和成书史料来源两方面，对《中华大帝国史》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其中，笔者在《〈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考述》中（高博，2019），基于欧洲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一手文献资料，曾对《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分别进行了考辨，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是《中华大帝国史》首版，但因其纰漏颇多，除作比较研究之用外，学术参考价值有限（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5）；第二，1586年马德里的克林诺·赫拉尔多（Querino Gerardo）出版社出版

的西班牙语本为门多萨允诺的最终修订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6），此版简称为“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其最近门多萨的真实书写意图。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学者普遍尚未认知这一版的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第三，《中华大帝国史》自“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问世五百年来仅存的两部中译本，其中一部是“何译本”，由何高济于1998年翻译完成（何高济，1998），另一部由孙家堃于2009年翻译完成，以下简称“孙译本”（孙家堃，2009）。“何译本”的参照源头是“1853-1854英译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853-1854），该本是1588年英文首译本的翻印本，笔者将之简称为“1588伦敦英译本”。“1588伦敦英译本”英语全名为：*The Historie of the Great and Mightie Kingdome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together with the Great Riches, Huge Citties, Politike Gouvernement, and Rare Inuentions in the Same. Translated out of Spanish by R. Parke*（《中华大帝国史及其相关情况，以及其拥有巨额财富和巨大的城市，政府建制及奇闻要事》，罗伯特·派克译自西班牙语）（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8）。

需指出的是，关于1588年英译本的参照源头，目前海内外学界持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西班牙历史学者索拉提出其译自1588年出版的法文首译本（SOLA, GARCÍA, 2016）。该法语本完整书名为：*Histoire dv Grand Royavme de la Chine Sitve' Avx Indes Orientales, Diuisée en Deux Parties: Contenant en la Premiere, la situation, antiquité, fertilité; religion, ceremonies, sacrifices; rois, magisfrats, mayrs, vs, loix, & autres choses memorables dudit royaume: Et en la Seconde, trois voyages Saits vers iceluy en l'an 1577, 1579. & 1581. avec les singularitez plus remarquables y veuës & entenduës: ensemble vn Itineraire du nouueau monde & le descouurement du nouueau Mexique en l'an 1583*（《位于东印度的中华大帝国历史，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包括中华大帝国史的概况、历史、土地肥沃、宗教、典礼、祭祀、国王、地方政府、市长、法律，以及该国其他令人难忘之事；第二部分：1577，1579和1581年的三次远航，以及您想要听到的奇闻要事：前往新世界的旅行和1583年发现新墨西哥》）。这是第一部《中华大帝国史》法语全译本，于1588年在巴黎由依莱米尔·皮埃尔出版社出版发行（Jeremie Perier），译者是卢克·得·拉波特（Luc de la Porte, 15..?-16..?），以下简称“1588巴黎法译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8）；第二种观点，赵欣认为“1588伦敦英译本”直接译自“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赵欣，2010）；第三种观点，笔者在《〈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考述》中曾一度赞同索拉的观点，但随着考证的深入，笔者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修缮和补充，提出“1588伦敦英译本”译自“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6）。这亦是笔者最新的研究结果，将在后续论文中列举详细考辨依据。尽管上述三种观点存异，但其均一致认为，“何译本”并非直接译自“1585罗马西班牙语首版”，而是由英译本转译而来。换言之，“何译本”是经多重语言转译而来的中译本。此外，另一部中译本——“孙译本”译自1990年现代西班牙语本。该西班牙语本的书名是：*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中华大帝国史》），以下笔者简称为“1990马德里西班牙语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990），其参考源头是“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GONZÁLEZ DE MENDOZA J., 1586）。因此，从版本源流上考辨，“孙译本”较“何译本”更贴近“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

此外，文献学视域下的另一代表作是对门多萨成书史料进行考辨。门多萨成书的重要参考来源之一是马丁·得·拉达（Martin de Rada, 1533-1578）的记述，以下简称为拉达。《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一部分第三卷第十七章有一章名为：*De los libros que el padre Herrada, y fus compañeros traxeron del Reyno de la China, y las materias de que tratauã*（《修士拉达神父及其同伴从中国带来的书籍的内容和情况》）（Mendoza, 1586:91-93）。此处标题书写延用了古西班牙语，其与现代西班牙语书写有别。本章明确提到了拉达在中国曾购买的图书种类，包括中华帝国概况，赋税，人口，造船术和航海术，中华帝国的历史及其偶像崇拜和信仰，其对生死以及天堂和地狱的看法，帝国的法律，本草要点，金石及其他自然资源，天体运动，民族情况，以及圣人的生活方式，人民如何休闲娱乐，音乐和歌曲，胎儿的孕育，建筑风格，土地质量，占星术，写信的格式，饲马和训马的方法，占卜和算卦，从皇帝到臣民的服饰，武器的制造和战阵的排列等。但是，这份书单只是介绍了这些书籍的内容，而并未明确说明这些书籍的具体名目（何高济，1998：123-126）。为此，刘捷在《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刘捷，2014）中对拉达从中国购买的书籍名目进行了考辨。刘捷根据拉达造访福建所处的时期，将彼时明代中国市面上流通的畅销书籍与前述门多萨提到的书籍内容进行了比较，发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和《新板全补天下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种日用类书的门类与拉达神父在闽所购书籍内容符合度较高（刘捷，2014）。他还指出，这三部作品的编撰者陈元靓、余象斗和刘双松皆为福建人，刊刻地点在建安椿庄书院、建阳双峰堂和建阳安正堂，这三地皆在福建。其中，刊刻于万历二十七年的《三台万用正宗》与门多萨书目最为接近，而此书也是三部类书中在刊刻时间上最接近拉达神父购书时间，万历三年。因此，刘捷断定，门多萨著《中国大帝国史》中所载中国图书，大部分是拉达神父在福州所购得的日用类通俗出版物。特别是，他还指出梵蒂冈图书馆至今仍存有《文林广记》、《万宝全书》、《不求人》、《万宝事山》、《龙头万宝事山天下一览不求人》、《增补万宝全书》等书²，特别是其中陈氏积善堂于嘉靖庚申年（1560）刻印的《文林广记》上³，更有大段作于1600年左右的西班牙语注释，这是对其论点的最好佐证（刘捷，2014）。

2. [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补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郭可译，中华书局，2006：16，54，94，96，117，150//刘捷.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 民俗研究，2014(03):42.

3. [法]伯希和编，[日]高田时雄校订补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郭可译，中华书局，2006：16//刘捷.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 民俗研究，2014(03):42.

基于该读本的文献考辩，上述两篇代表作仅是一个开端，仍存有诸多问题有待后续研究来解答，如关于版本研究，“何译本”与“孙译本”两部中译本在内容上具体有何差异？孰更忠于门多萨的原著善典之意？孰更近门多萨的真实书写意图？孰更具学术参考价值？其译本差异背后之原因何在？以及各语言译本是忠实还是悖离了门多萨的书写意图？这些问题均有待后续研究在跨学科视域下，对各版本进行详细比较和深入分析。再如，门多萨曾在福州购得的中文书籍现藏于何处，是否能找到实证？这也有待后续研究挖掘更多的史料。

5. 结论

《中华大帝国史》于1585年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首次出版刊印，五个世纪后，其于1998年才首次被介绍到中文语境下。从1998年至2020年的近23年来，在中文语境下，笔者仅检索到了10篇公开发表的以该读本为中心议题的专题性研究。可见，中国学界尚未普遍认知到该读本的重要学术参考和研究价值。按照研究视域，此10文可归纳为3类：历史学者在欧洲史、中西交通史和民族志视域下的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及文献学视域下的版本和成书参考来源考辩。目前中国学界对这部读本的关注尚且有限，此10文仅是一个开端，诸多问题有待后续研究来探讨，如门多萨成书资料详考，门多萨所处时代的背景与生平考证，门多萨未能出使中国之原因，《中华大帝国史》对同时代欧洲有识之士的影响，以及基于这部读本的中西交通史实勘误和16世纪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等。此外，这部读本在不同语境下与不同时代下的译本与原著善典有何差异，有待对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和政治因素等进行深入解读等，以上诸多议题目前均是研究空白。不容忽视，此10文蕴含着跨学科融合的趋势，即一篇研究以某一学科视域为主，但同时又融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未来有待进一步融合殖民与后殖民理论，东方学，文化批评，宗教学，文献学，历史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不同视域下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对这部读本进行深入研究。这亦是《中华大帝国史》研究者下一阶段要面临的挑战。

最后，需提及的是，《中华大帝国史》被翻译和介绍到中文语境以来，中国学者在其研究中一直普遍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其并未指明选用版本缘由，因此，也更未对版本进行考辩。而版本选用之欠考究性，不但会使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及使用的文献，较之于原著善典有着多处认知错误和史实纰漏，甚至还会使研究者悖离原作者的真实书写意图。“1586马德里西班牙语修订本”是门多萨允诺出版的最终修订本，其最近门多萨本人的真实书写意图（高博，2019）。因此，这一版也是研究门多萨构建的16世纪欧洲社会视域下的中国形象，最具学术参考价值的一版。

参考文献

- [1]高博.《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善本和中译本源流考述[J].图书馆杂志,2019,38(02):95-104.
- [2]高岩.《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中国形象——兼论16世纪伊比利亚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D].北京:北京大学,2005:16.
- [3]高宇灏.前利玛窦时代欧洲人的中国意象[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5:13-14.
- [4]刘捷.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J].民俗研究,2014(03):35-42.
- [5]曼特刹.中华大帝国史(第一册)(第二册)[M].北京:出版社不详,1940.
- [6]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M].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
- [7]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M].孙家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 [8]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M].孙家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9]汤开建.明隆万之际粤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以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史料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06):43-65,191-192.
- [10]吴孟雪.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上篇)[J].中国文化研究,1996(01):131-136.
- [11]吴鸿谊:十六世纪葡西旅行者眼中的「大明」——一个民族志的视角[D].台北:台湾大学,2015.
- [12]《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日本东京大学所藏之万历四十年安正堂刘双松刊本[M]//刘捷.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民俗研究,2014(03):35-42.
- [13]《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中华书局影印之元朝至顺年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M]//刘捷.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民俗研究,2014(03):35-42.
- [14]《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本,余象斗序双峰堂刊本[M]//刘捷.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民俗研究,2014(03):35-42.
- [15]张铠.16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M]//黄时鉴编.东西交流论谭第1辑,上海:上海文玄出版社,1998.
- [16]赵欣,计翔翔.《中华大帝国史》与英国汉学[J].外国问题研究,2010(02):56-61.
- [17]邹雅艳.16世纪末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为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43-50.

- [1] GONZÁLEZ DE MENDOZA J. *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como por relacion de Religioso y otras personas que an estado en el dicho Reyno*[M]. Roma: Vicencio Accolti, 1585.
- [2] GONZÁLEZ DE MENDOZA J.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M]. Madrid: Querino Gerardo, 1586.
- [3] GONZÁLEZ DE MENDOZA J.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M]. London: I. Wolfe Edward White, 1588.
- [4] GONZÁLEZ DE MENDOZA J. *Histoir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 situe aux Indes orientales, dinisés en deus parties*[M]. Paris: Ieremie Perier, 1588.
- [5] GONZÁLEZ DE MENDOZA J.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M].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53-54: 55, 88.
- [6] GONZÁLEZ DE MENDOZA J.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compiled by Juan Gonzalez de Mendoza*[M]. Translated by R. Parke, edited by Sir George T. Staunton.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0.
- [7] GONZÁLEZ DE MENDOZA J.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M]. Madrid: Polifemo, 1990.
- [8] SOLA GARCÍA D. *La formación de un paradigma de Oriente en la Europa moderna: la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de González de Mendoza* J[D]. Barcelona: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2016.

